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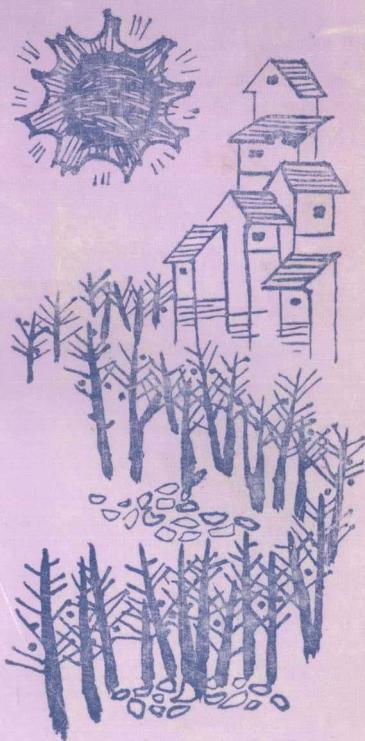
·中国新诗库·

ZHONG GUO XIN SHI KU

第三辑

周良沛 编选

冯
雪
峰
卷



长江文艺出版社



· 中国新诗库 ·

ZHONG GUO XIN SHI KU

第三辑

周俊杰 编选

冯
雪
峰
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中 国 新 诗 库

第 三 辑

冯 雪 峰 卷

周良沛 编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新诗库》 第三辑

冯雪峰 卷

周良沛 编选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30毫米 32开本 3.25印张 3插页 1800行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54—0494—4

I.426 定价：1.60元

卷 首

周良沛

冯雪峰(1903—1976. 1. 31), 笔名有雪峰、画室、吕克玉、成文英、何丹仁、O·V等。生于浙江义乌一个山村。父母务农, 自幼放牛、下田, 十岁入私塾读书, 次年入县立小学学习。1918年高小毕业后, 考入金华浙江第七师范学校, 1921年因参加学生运动, 被学校开除。秋天, 到杭州当时视为南方新文化运动堡垒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参加了潘漠华、柔石、魏金枝、汪静之等组成, 并请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三位师长为顾问的“晨光社”。次年二月《诗》发表了他的新诗创作《小诗》。三月末, 应修人自上海来杭州会晤有通信联系的诗友汪静之, 汪又邀上潘漠华、冯雪峰同游西湖。四人一见如故, “诗文唱和, 快乐无穷”, 由应修人提议, 将四人的诗合成一集出版, 成立“湖畔诗社”。

《湖畔》四人集遭亚东图书馆拒绝, 由应修人自费出版, 这是新诗运动中继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俞平伯的《冬夜》之后出现的第四本新

诗集，引起强烈的反响。四位青年受到极大的鼓舞，又合编了《春的歌集》出版。

1925年春，二十二岁的雪峰到北京，拿上潘漠华的旁听证，在“北大”听课，当校对，当家庭教师，赖以维持生计。租不起房子，常常是爬在友人外出的空铺上睡。1926年开始从事翻译工作，见到了鲁迅，并在鲁迅领导的未名社的《未名》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毛泽东在南方看到他的诗文，请别人转告，说他喜欢雪峰的诗，并希望他到南方来参加革命工作。

“四·一二”后，他在敌人大屠杀的血腥中参加了共产党。十一月，因一部译稿上写有“献给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人们”被抄查出而被追捕，二十四岁的叛逆者，只好逃往上海，在鲁迅先生的指导下，继续从事翻译和编辑《萌芽》月刊、《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等，译介了普列汉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等许多重要的文学论著。

1929年10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工作，为“十二个基本成员”之一。1931年任“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任中共上海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书记，1933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在“左联”时，为纪念“左联”五烈士，抗击白色恐怖，在鲁迅的指导和协助下，秘密编辑出版了《前哨》杂志。

1933年底秘密离开上海，到红色根据地江西瑞

金，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时值毛泽东被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从领导岗位排挤下来，与雪峰一见如故，党校有时杀猪，雪峰就请毛泽东来会餐，有时发了津贴两人就一道下小馆。两人散步交谈文学、诗歌和白区进步作家遭受的迫害、屠杀以及他们的斗争，交谈中对鲁迅先生的斗争、写作、健康等情况，毛泽东非常关心，反复询问。有一次，毛泽东说：他们（指王明等人）想叫鲁迅来这里当教育部长，我看鲁迅还是当作家好。

1934年开始，雪峰从江西瑞金出发，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在红军大学和党校工作。红军渡河东征，他率领一个工作小组，在征战中同部队失掉联系，经过十几天的艰苦战斗才回来。1936年自陕北瓦窑堡接受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具体安排到上海的工作，秘密骑马到了张学良部队里，然后转乘张学良部队的汽车到西安。1936年4月25日到上海的次日就见到鲁迅。向他传达了红军长征胜利、遵义会议等情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雪峰在先生家住有半月，日夜倾心相谈。在先生起草《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时，雪峰曾予以协助。还笔录了先生的《论我们的文学运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在先生家中，还同美国著名记者斯沫特莱

长谈。这次晤谈，被写成新闻稿发出，在敌人严密的封锁下，这是第一次较系统地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后，又一美国进步作家爱德加·斯诺到上海拜访宋庆龄，说他很想到陕北根据地采访，宋庆龄找到雪峰，转告了斯诺的愿望。雪峰报告了周恩来，研究、安排了斯诺的陕北之行。斯诺此次绕道化装的秘密行动，回来公开了他那震惊中外的巨著——《西行漫记》。

在瑞金、长征、陕北，毛泽东多次和雪峰谈到他壮烈牺牲的夫人杨开慧烈士，以及她牺牲后几个孩子在上海失落的情况。雪峰在上海到处打听，终于在有关人士家里找到了两个孩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然后他派人把他俩送到国外，途经巴黎，转到莫斯科学习。

雪峰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任过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抗日战争初期，他对投降主义路线作过激烈斗争。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病逝上海，雪峰参加主持丧事，在他和宋庆龄、蔡元培等商量拟定的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人们惊喜地看到毛泽东的名字。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在上饶集中营关押了两年。受尽折磨摧残，始终坚贞不屈。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雪峰在1925—1941年间的任何一首诗

作。也就是说，自《湖畔》之后的十六年，他都再没写诗了。可是，在集中营，他自称为“最灰暗的日子”里又写起诗来，数量远远超过他在“湖畔”时的作品，也不再是朱自清称许的《湖畔》“清新和缠绵底风格”^①，雄浑、深沉。是这位“湖畔”诗人写的很不“湖畔”的诗，应该看作他最重要的作品。1943年在重庆编辑出版的诗集《真实之歌》（重庆作家书屋，1943），1946年又经他自选改编，以《灵山歌》为名在上海出版。

他出集中营，是毛泽东、陈云在延安得知他关押在上饶，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设法营救，几经曲折，由宦乡等保释出来的。以后就一直坚持在国统区作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中共代表团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是他获得蒋介石要软禁毛泽东的情报，请周恩来各方通气、工作，由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冯玉祥等写信给蒋介石，说外面有此种流言，有损“委座”的形象，才使蒋介石哭笑不得，阴谋未能得逞。1947年3月，和谈破裂，中共“联络处”撤退，雪峰仍然坚持在上海工作，到1949年4月含着热泪迎接了上海的解放。

解放后，历任上海文联副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

① 朱自清：《读〈湖畔〉诗集》，《文学旬刊》1922年第39期。

报》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8年初，在“反右”运动后期，这位一生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和统战工作付出全部心血者，这位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同鲁迅最贴近的学生和战友，却要他自认反党，自认挑拨了党和鲁迅的关系，自认是丁玲反党的后台，是“右派”。他的精神不仅是为自己，而为国家如此不解、痛苦，度其漫长的苦难历程。在此期间，他还参加《鲁迅全集》的编校注释出版工作，用十几年时间搜集和研究“太平天国”史料，准备写一部长篇巨著；还准备写一部关于鲁迅的著作。但各种无情的折磨和体力无法适应的劳动，使他一次次病倒。只要能坐起来，他就提笔解复堆在床头案前各方鲁迅研究工作者向他提出疑难的来信。在举国沉浸在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悲痛里，病痛缠身的雪峰，为日等夜盼，苦等苦熬，想以自身经受磨难的坚贞盼望的昭雪，当在二十年后还不见，病体突告恶化。他向党组织和身边的同志，诉述了他二十年来只望能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愿望，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于悲愤之中黯然长逝。

雪峰一生，译著俱丰。二三十年代，他译有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上海水沫书店，1929）、卢那卡尔斯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上海

水沫书店，1929)等进步文艺理论与创作达十余部。抗日战争时期著有论文集《鲁迅论及其它》(充实社，1940)、《乡风与市风》(重庆作家书屋，1944)、《有进无退》(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5)、《跨的日子》(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6)。抗战胜利后，有《过来的时代》(上海新知识书店，1946)、《雪峰文集》(上海春明书店，1948)、《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上海作家书屋，1947)及寓言集《今寓集》(上海作家书屋，1947)、《雪峰寓言三百篇》上卷(上海作家书屋，1949)。解放后，有电影文学剧本《上饶集中营》、《论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1)、《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论〈保卫延安〉》、《论〈野草〉》(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寓言》(作家出版社，1956)。在他最后的日子致力于长篇历史小说《太平天国》的创作，未完稿。

比起他这一长串的译著的书目，他的诗，只有“湖畔诗社”自印湖畔同仁的诗合集《湖畔》收有他十七首诗，《春的歌集》收有他十一首诗。四十年代，出版了《真实之歌》(重庆作家书屋，1943)和《灵山歌》(作家书屋，1947，上海)。前者，是他1922—1923年间在杭州读书时的作品，后者，是他1941—1942年间囚于上饶集中营时的作品。他一生之中，前后

总共只有三年多时间写了新诗。然而，“湖畔”却是新文学史上无法不记上的一群诗人；冯雪峰的名字，是应该列在新诗的先行者胡适、郭沫若、刘半农、冰心等之列的。

几乎约定俗成的，多说“湖畔”是新诗运动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艺术流派。1957年3月冯雪峰为《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写序时却说“湖畔诗社”“实际上是不能算作一个有组织的文学团体的。只可以说是当时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的一种友爱结合”。当然，“友爱结合”者之间，自然也是可以形成艺术流派的。艺术流派，是在一定历史时期里，文学见解和艺术风格近似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结合。友爱可以促成这种结合。之所以结合，也可以为“文学见解和艺术风格近似”。

朱自清说“《湖畔》里的作品都带些清新和缠绵底风格”，“因作者都是二十上下的少年，都还剩着些烂漫的童心”，“还能保留多少清新的意态”。“《湖畔》里的诗大都是咏自然”，“大都宛转秀逸，颇耐人思”。当中，朱先生也提到“漠华、雪峰二君”有些作品，则是表现“人间的悲与爱”了^①。

本来，一个流派的艺术之所以称之为艺术，其作品，就不应该陷进一个模式。《湖畔》中不少当时

^① 朱自清：《读〈湖畔〉诗集》，《文学旬刊》39期。

颇为流行的所谓“小诗”，它基本上是影响于周作人介绍来的日本俳句，冰心介绍泰戈尔(Tagore 1861—1941)的小诗而成气候的。在《湖畔》中的“小诗”，并非用十七音，以即景寄情取胜的俳句式的“小诗”。虽然周作人说过汪静之的《小诗(一)》有日本短歌的“意思”^①，但从整个《湖畔》看，其中“小诗”受影响于泰戈尔是更多于日本俳句。而冯雪峰，一开始写的“小诗”似乎就已排除了外来的影响，在毫无顾忌，悠然自得的在“自我表现”了。

现在可以找到诗人最早公开发表的一首诗，就题名为《小诗》：

我爱小孩子，小狗，小鸟，小树，小草，
所以我也要做小诗。
但我吃饭偏要大碗，
吃肉偏要大块呵！

许多有关雪峰诗作的评论，都要提到这首诗。说它是最“雪峰型”的诗，这怕只是指雪峰一开始就以一个农民之子蛮率无忌，天真大胆地闯进诗苑之情而袒露在这首诗上。其实，雪峰的诗是很不定型的。如同时期的《花影》：“憔悴的花影倒入湖里/水是忧闷

① 周作人：《论小诗》，《觉悟》(1922.6.29)。

不过了/鱼们稍一跳动/伊底心便破碎了”，它与前者相比，已象另一个人的手笔。它追求一种意境、情调，湖水、花影如人心，是诗的形象，也含有喻意。它和《小诗》那种天真的直白，构成的完全是两种艺术兴味。这很能表明，雪峰一开始写诗，既非幼嫩的不定型，也非艺术成熟式的定型，而是显出他的诗的多方面的可塑性。但《小诗》中的小草，小诗与大碗，大肉之“大”“小”，不仅可以看作艺术的对比作用，从中也确实可以看到，诗人于诗之“大”志。他后来的创作，尽管不都是“小诗”，也不是“大”诗，然而，他却追求在不大的诗里，有颗大的诗心。

从诗的语言看，作为“五四”后出现的第四本新诗集《湖畔》，它既不象胡适的《尝试集》，“很象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它不象郭沫若的《女神》，叛逆传统而溶进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也不象俞平伯的《冬夜》，“融旧诗的音节入白话”。“湖畔”同仁，运用口语是活泼自然，又不同于当时相当一部分以示“解放”而流于散文化的语言。雪峰的《小诗》、《花影》，也能说明这点。他总是想使自己的“小”诗不小，有比较坚实的内涵。如《灵隐道上》，虽然“我们知道/苦痛的种子已散遍人间了”这样的诗句，还是浅白，然而，作者从轿上的妇人“遮不了满心的悲苦”，总在探寻这一现象与社会生活的联系。

尽管写得不深，不足，但在当时，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作如此想，还是先进的思想。他在十八岁时写过一首《三只狗》：

月亮底下的草场中，
三只狗面对面地坐着；
看看月亮怪凄凉的。

有个人走到那里，
它们向他点点头，
仍旧看它们的月亮，
而且亲亲嘴摇摇耳朵。
他呆了一会，
说，“它们相恋着罢。”
他流流眼泪回去了。

月亮底下的草场中，
三只狗面对面地坐着；
看看月亮怪凄凉的。

依照当代一阵的“朦胧诗”热之后，又寻编的现代的“朦胧诗”，它也应该是够格入选的作品。但是，如果仅仅看作诗人在写月下草场上这么一个场景，它又实在不“朦胧”了。而且，从雪峰的全部诗作看，

他还不是就事写事的诗人。同时，这里也没有必要为《三只狗》作解读。从这十三行诗看，作者如实地对这场景的写实，他不是想表达自己从中所意识到的东西，也可能表达他感受动心而不一定能明确意识到的东西。看三只狗“看看月亮怪凄凉的”，绝非出于“狗道”主义的同情，“它们相恋着罢”，要说是观察所得的印象，不如说是辛酸的戏语。不论作者意识或感觉的是什麼，不论何种解释能接近作者的创作意图；作品本身，才是这些意识、感觉、意图的现实。从它，还是看到生命在生存中的某种迷惘而互怜的状态。若说《灵隐道上》那种题意的提示，更具社会学的色彩，那么，《三只狗》就更具有艺术的表现了。它们都同样可以让人看到，诗人总在让诗的內涵大于它的形式。就是他写的情诗，就是人们认为“湖畔”诗人擅长写的情诗，也不是流行的那种轻柔的、甜甜的情诗。如《愿良人早点归来》，其中村妇思夫就不是古典式的闺怨。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劳动者，怕孩子饿了“便哭叫爸爸”，是雷雨中，外面的干柴给雨打湿弄不回家，是风吹倒豆藤，地上的麦穗忙不过来拾时在痛苦的叫道：“你不在家，谁帮我忙？良人，愿你早点归来！”给读者打开一扇全新的爱情的心扉。《被拒绝者底墓歌》，墓中人“他以未死的爱情/在墓上开放烂漫的花”，要引来“他不能忘情的姑娘”。读来感到的，要

说是男子单相思的痴情，不如说是一种人生执着的追求。这从诗人早些时候的《雨后的蚯蚓》，也可以看到这点。

雨止了，
操场上只剩有细沙。
蚯蚓们穿着沙衣不息地动着。
不能进退前后，
也不能转移左右。
但总不息地动呵！

雨后的蚯蚓的生命呀！

生命的运动，不息的进击！这是雪峰的精神，也是雪峰的艺术。

雪峰说，“‘五四’新文学在形式和精神上不同于旧文学，这正是中国文学的现代化”^①。这话虽然说于五十年代初，也是他在文学活动中自始至终的追求。当他还是十几岁的“湖畔”诗人时，对此，不一定有此理论上的明确，却有创作实践的成效。应修人写过一首与雪峰同题的《雨后的蚯蚓》：

^① 《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雪峰文集》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